陈述信

|  |
| --- |
| 耿弘明老师：  您好！我是软件学院赵晨阳（学号2020012363）。   * 修改后的主题为：从人格差异角度探究梁启超与康有为聚散离合背后的原因。 * 此次修改主要集中在对语言风格的全部改造（由高考文艺青年体不断向论说体艰苦迈进）与增加与其余学者的对话。 * 在初稿修改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于语言风格难以一时改变。从10月24日至10月31日的改稿过程中，本人通过每日阅读文献，模仿文献的语言风格不断改正自身的语言风格。 * 接下来打算通过对社会心理学与人格心理学的研究进一步探究梁启超的“流质性”成因并尽可能精炼字数。   赵晨阳  2020年10月31日 |

“凝固的叹息”与“流淌的自强不息”

——浅析康梁二人缘何相聚又分离

[赵晨阳（2020012363，zhaochen20@outlook.com）](mailto:赵晨阳（2020012363，zhaochen20@outlook.com）)

摘要：笔者认为，二者人生轨迹的差别源于梁启超的“流质”性与康有为的“凝质”性之间的根本性差异。所谓“流质”，指具有一定可流动性的液态物质，常与多变、多欲、机智、随和、无成见等性格特征相联系。而“凝质”，此处指凝聚的固态物质，具体表现为执着、强毅、主观、自信、自负、有成见、拘文牵义、不为流俗所动等性格特点。梁启超的“流质性”使其政治思想几经变迁，并最终走上了民主立宪的道路。“流质性”确可称之为其人生闪耀之光芒！

关键词：梁启超；康有为；流质；凝质；辛亥革命；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

自光绪十六年康梁二人相识于上海起，历经万木草堂的师生之谊，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的惺惺相惜，流亡海外的相互挂念，辛亥革命后的争锋相对，康有为离世后梁启超的悲痛惋惜，二者的人生道路聚散离合，命运交织纵横，各自在老大中国向少年中国行进的过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康有为终其一生没能走出他四十岁时的执念，囿于《三世说》、《公羊学》等三十所成学识，抱着虚君共和的执念病逝青岛。戊戌变法俨然为其人生巅峰，其后逐渐黯淡无光，直至去世，令后人争论不休；梁启超则自公车上书始登历史舞台，戊戌变法仅为其拉开序幕。饮冰室主人，思想之进步，人格之高尚，治学之巍然，百年后的今天仍令人感佩。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二人的人生轨迹产生如此重大差别？有鉴于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探析。

笔者认为，二者人生轨迹的差别源于梁启超的“流质”性与康有为的“凝质”性之间的根本性差异。[[1]](#footnote-1)康有为晚年寄信梁启超，“汝真一极流之质, 吾一凝质, 望汝后勿再流而已”[[2]](#footnote-2)，便已然指出这一差异。所谓“流质”，指具有一定可流动性的液态物质，“常与多变、多欲、机智、随和、无成见等性格特征相联系”[[3]](#footnote-3)，符合古人上善若水的观念，也可作为梁启超一生的写照。而“凝质”，此处指凝聚的固态物质，“具体表现为执着、强毅、主观、自信、自负、有成见、拘文牵义、不为流俗所动等性格特点。”[[4]](#footnote-4)康有为言他一生学识自三十岁起便不应再变，也不会再变。不应再变，折射着康有为对自身学识的自信；而不会再变，无法再变，却无疑反映其人格的局限性。若将康有为视为“凝质”，那么他的人生便是“凝固的叹息”，自戊戌政变后，凝固为一声悲叹。悲叹改革无方，皇权凋敝，救国之心有余而力不足，仅此而已。而若将梁启超视为“流质”，那么他的人生便是“流淌的自强不息”。映照着他在清华学堂以《君子》为题的振聋发聩之谈，也高度凝练地概括了他“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5]](#footnote-5)的人生。后文将逐一加以例证。

一、从万木草堂到东渡日本：初遇与别离

康梁二人的人生轨迹，可概括为求学草堂时的初遇，逃亡日本后的分离，自美归来后的重逢与最终辛亥革命后的诀别。两聚两别，皆与“流质”与“凝质”之别密切相关。

（一）万木草堂：流质与凝质的初遇

笔者认为，梁启超求学万木草堂时，人格差异巨大的二人聚为知己的本源，在于19世纪末，康有为的“凝质”思想——君民共主，变器变道——极大地吸引并启迪了少年梁启超。

自上书不达，康有为离京返粤，痛感民智未开，创立万木草堂并亲执教鞭、推动维新。机缘巧合下，梁启超结识了恩师康有为。几经深谈，梁启超心中旧学一朝间彻底破碎。“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6]](#footnote-6)康学“凝质思想”所含有的君主立宪、维新改制理念，于当时的梁启超而言，超乎贴括、训诂之外，在其“流质思想”的沃土间萌芽。

四载从师学习后，梁启超师承来自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改良主义扎根之深，即便在戊戌变法后至辛亥革命前的十余年间，政治思想上走“之”字形道路的梁启超大部分时间依然以改良主义为主。譬如逃亡日本初期，梁启超依然唯师命是从，认定民智未开，缓行民政。乃至1899年3月在《清议报》上发表《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故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7]](#footnote-7)

（二）东渡日本：政治思想的初次分离

可见二人初遇遇即塑造了梁启超“流质思想”的底色——改良主义，然而改良主义并未能禁锢梁启超思想的“流质性”。自东渡日本后，梁启超亲身接触资本主义世界，博览西方资产阶级大量启蒙作品，政见暗中改变，认为之前仅依靠阅读了解资西方各国“是无疑于据明史以言今日中国之时局也。”[[8]](#footnote-8)1898年10月至1899年3月，梁启超已私下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相来往。1899年3月康有为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后，梁启超在思想上得以挣脱康有为的束缚，成为在日维新派的领袖，公开与孙中山等来往密切，商议两党合并之事。1899年至1903年初，梁启超大力提倡民主自由，鼓吹破坏主义，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在1900年写予康有为的万言长信中，梁启超详尽地阐述了对于民主自由的理解，坚信民智、民权、民政涤洗社会。“以万钧之力，激励奋迅，冲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至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怒。”[[9]](#footnote-9)他主张的破坏根本目的在于社会变革（revolution）而非昔日的社会改良（reform），并已不再如以往一般拳拳服膺康学，甚至对于康有为“保孔保教”的思想加以批驳。他直言：“为两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10]](#footnote-10)二人政治思想的巨大分歧终于公之于众。

二人逃亡日本后的分离，本质上是梁启超的“流质思想”使其欣然地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与共和思想所致，以往康有为“改良维新”的烙印也未能阻遏这一思想流动。破除四书五经、刻板教条的旧论，使梁启超结缘康有为；也因为破除尊孔保教，变法维新的旧论，梁启超与康有为分离。综上所述，“求学草堂时的初遇”，“逃亡日本后的分离”皆是“流凝之别”使然。

二、美国归来至辛亥革命：重后诀别

基于前文观点，1903年梁启超自美国归来后竟然与康有为在政治思想上重逢，反而令人匪夷所思。难道梁启超的思想竟然“凝质化”，以至于政治思想倒退？答案无疑是否定的。经研究，我们仍然能够得出结论，此次重逢依然是梁启超的思想“流质性”所致。

（一）自美归来：重逢康门与开明专制

笔者认为，此次重逢受两方面因素作用。主要因素为在美国考察期间，梁启超先前对美国民主政治的过高期望与美国政治现状间的显著差异使梁启超对渴求的民主共和理想产生深度怀疑。梁启超心中近乎理想的美国政治制度，却存在着政党分赃、庸才当政、市政腐败、大党专权等重大弊端。基于晚清中国民族性的落后，梁启超认识到国民性改革艰难，并以此深刻反思中国民主共和的可行性。这一反思促使梁启超再次思想流动，从民主共和流向开明专制，即所谓的“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无奈这一时期的思想流动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为思想倒退，使人误解为思想“凝质化”。但是深入分析其思想变迁，我们仍然得出结论，这依然源于“流质性”带来的思想流动而非“凝质化”造成的思想倒退。

另一方面，师生关系的致变作用也促使了二人政治思想上的重逢。流亡日本后，由于思想激进化，宣扬破坏主义、革命排满，梁启超与维新旧友日渐隔阂。然而结识孙中山等革命派人士后，梁启超与革命党人来往密切，加之时务学堂弟子东渡日本再度从师，梁启并未超在个人境遇上感到孤独无助。无奈1899年12月梁启超奉师命前往檀香山统筹保皇会事宜，再度为武装勤王筹措经费。檀香山为兴中会发源地，保皇会发展有损兴中会势力，二者不得不竞争有限的华侨捐款。梁启超如此行为，不一定是出于欺骗[[11]](#footnote-11)，但对于兴中会确可称为“欺人太甚。”革命党纷纷认为“（梁启超）保皇是真，革命是伪，强调革命与保皇如黑白两东西，冰炭水火，必须划清界限，不能混淆。”[[12]](#footnote-12)于是梁启超与革命党关系迅速恶化。同时，梁启超自檀香山归来后，由于康有为认为自立军起义失败是门生筹款不力所致，加之这一时期的梁启超政治思想已发生框架性巨变，难以与康有为达成共识，师生二人矛盾空前。尽管梁启超与两党皆出现分歧，但师生情谊毕竟仍然维系在康梁之间，维新派俨然还有容留梁启超的可能。基于对美国社会制度的深刻反思与师生关系的致变作用，梁启超思想再度流动，回归维新堡垒，并提出“开明专制”理念，指出“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13]](#footnote-13)至此，康梁二人得以在政治思想上重逢。

（二）辛亥革命：民主立宪与虚君共和的诀别

1907年9月，清廷设立资政院，这仿制议院的机构仿佛透露着清廷改革的决心。无奈统治阶级过于迂腐，资政院大多议员仍为满清贵族，并且历尽波折派遣的留洋考察使者归国后竟得出结论：君主立宪不适应大清国情。世人皆以为立宪拯救中国，清廷毫无诚意的改革令人大失所望，革命声势日益浩大，武装斗争与群众运动如火如荼。梁启超无奈间发现，除非革命，寄希望于清廷自新来救老大中国太过困难。其政治思想再次流动，在开明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立宪政治，并形成了立宪派，再次与康有为发生分歧。不过这时的分歧更多应看做继往开来而非诀别。

二人的诀别发生于辛亥革命后。武昌起义后，仍然对对清廷抱有怀想的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一片欢呼雀跃，群起组织立宪共和党派，并得到革命派的接纳。梁启超主张“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仍固守“虚君共和”，二者矛盾越发尖锐。民国成立后，康有为尊孔保教，积极复辟，为袁世凯利用后又参与张勋复辟。梁启超则坚持维护民主立宪，哪怕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关键时刻，亦决然冒着生命危险与蔡锷一同起义。针对喧嚣甚上的复辟逆流，梁启超挥笔书就《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康有为在《上海周报》发表文章《为国家筹安定策者》，梁启超则发表《辟复辟论》，终于将矛头直指康有为，痛陈其师“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14]](#footnote-14)“师弟自师弟, 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 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15]](#footnote-15)而康有为则痛斥其为“梁贼启超”，二者于此诀别，此后长期交恶。

纵观康梁二人的再度聚散，可见，“凝质”与“流质”的差别仍然为主要因素。站在康有为的视角，“凝质”固守的虚君理念必然无法与君主脱钩。无论是光绪还是溥仪，君主是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无法从坚持数十年的理念中脱身，与其接受民主共和，宁可选择复辟，单纯地渴求把20世纪的政治问题化归到19世纪末的社会环境下解决，然而社会早显著异化。

与此同时，梁启超的“流质”本性也决定在大多时刻，他的思想皆维系着拯救当世中国的最佳路径。变法之前，革命成本高昂，改革社会制度无疑是一味良药。而变法之后，世人皆意识到了清廷统治阶级腐朽不堪，变法俨然无以救中国，而“凝质”康有为仍固执地坚持变法、维新与改良，甚至不惜走上复辟的道路。“流质”梁启超则历经数次思想流动，几经变迁，最终探寻出独到的适宜当下中国的不二良方。

三．后世之思：“流质”之所以“流质”

综前所述，究其一生，康有为都没能走出着他脱离现实的执念，温和地改变政体，“虚君共和”。戊戌变法后其人生几乎仅剩“凝固的叹息”。对梁启超而言，戊戌变法却只是他政治生涯的起点。或者说，康有为的人生巅峰仅仅是其人生起点而已。固执迂腐的“凝质”最终与善变的“流质”分道扬镳。

每每有人批评梁启超善于政治投机，寻求机会。但笔者认为，站在梁启超的立场上，其一切决定皆遵从内心。变法破灭时，反对革命是真诚的，辛亥革命前夕认可革命也是真诚的；少年时汲取西方文化渴求民主自由是真诚的，游历北美后认定西方文明已死也是真诚的。笔者在此提出，梁启超的“流质”性本源乃是梁启超对于东西文化皆有其深刻的洞悉。相较于同时代大多人，包括他的恩师康有为，他更为接近东西文化各自的内核。故而，当各式思想与政治派系相互争斗时，梁启超总能及时发现何者更为适宜当下的中国。出于此，他要么成为各派争取的对象，要么成为各派争相批判的对象。千年未有之大变革下，他总能及时洞察每种政治主张背后的合乎东方或者西方文化的道理。在不同的境地下，他深刻地理解到各个流派自身的局限性与合理性，并付诸行动。“流质”性乃梁启超遗世独立、超然世人的本源。可惜，另一方面，“流质”性或许也是梁启超的莫大遗憾。终其一生，他没能将自身所意识到的丰富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内化为完整的思想体系。

总有人感慨，梁启超若不是因为医疗事故病逝，或许可以将自身的思想“凝质”化为完整的思维体系，也许现在世人便可研习“梁学”如同研习王阳明心学一般。可笔者仍然认为，假以时日，梁启超依然不会将自身的理念“凝质”化。如果将康有为喻为“凝质”或者说死水，那么梁启超便是“流质”或者说源头活水。“流质”，或许梁启超遗憾之处，却更是其人格中最大的光芒。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研究光绪年间至民国初年康梁二人的两聚两散，分析二人的人格差异，得出结论：康梁二人的聚散离合乃“流质”与“凝质”之间的差异性使然。梁启超的“流质性”使其政治思想几经变迁，并最终走上了民主立宪的道路。“流质性”确可称之为其人生闪耀之光芒！

参考文献

王明德：《凝质与流质之间——康有为、梁启超的个性差异与其不同的政治境遇》，《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77页.

康广仁：《与何易一书》，张元济编著；《戊戌六君子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年，第65页。

黄跃红,王明德：《辛亥革命后康梁不同政治景遇之性格分析》，《求索》,2005年第8期，188页。

黄跃红,王明德：《辛亥革命后康梁不同政治景遇之性格分析》，《求索》,2005年第8期，189页。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编著；《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7页。

梁启超：《三十自述》，崔志海编著；《梁启超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16页。

梁启超：《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0页。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编著；《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5页。

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7页。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易鑫鼎编著；《梁启超选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341页。

郭世佑：《梁启超庚子滞留檀香山之谜》，《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26页。

孙中山：《复黄宗仰》，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编著；《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5页。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7页。

解玺璋：《梁启超传》，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2012年，第46页。

经堂:《康有为与梁启超》,《古今月刊》，创刊号 , 1942年第1期，19页。

邓杰：《1903年前后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原因探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第2期，第134-139页。

喻中：《共和萌生的思想镜像: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5期，第199-208页。

杜先菊：《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104-113页。

赖骏楠：《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个人”与“国家”——以“1903年转型”为核心考察对象》，《 清华法学》， 2016年第3期，第147-166页。

付金柱：《“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梁启超政制观转变的美国因素》，《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32期，第105-114页。

桑兵：《梁启超与共和观念的初兴》，《史学月刊》，2018年第1期，第53-69页。

班玮：《梁启超的日本观》，《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35-41页。

张卫娣：《梁启超国家主义转向的日本因素——以加藤弘之为中心》，《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第88-94页。

1. 王明德：《凝质与流质之间——康有为、梁启超的个性差异与其不同的政治境遇》，《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77页. [↑](#footnote-ref-1)
2. 康广仁：《与何易一书》，张元济编著；《戊戌六君子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年，第65页。 [↑](#footnote-ref-2)
3. 黄跃红,王明德：《辛亥革命后康梁不同政治景遇之性格分析》，《求索》,2005年第8期，188页。 [↑](#footnote-ref-3)
4. 黄跃红,王明德：《辛亥革命后康梁不同政治景遇之性格分析》，《求索》,2005年第8期，189页。 [↑](#footnote-ref-4)
5.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编著；《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7页。 [↑](#footnote-ref-5)
6. 梁启超：《三十自述》，崔志海编著；《梁启超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16页。 [↑](#footnote-ref-6)
7. 梁启超：《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0页。 [↑](#footnote-ref-7)
8.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编著；《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5页。 [↑](#footnote-ref-8)
9. 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7页。 [↑](#footnote-ref-9)
10.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易鑫鼎编著；《梁启超选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341页。 [↑](#footnote-ref-10)
11. 郭世佑：《梁启超庚子滞留檀香山之谜》，《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26页。 [↑](#footnote-ref-11)
12. 孙中山：《复黄宗仰》，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编著；《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5页。 [↑](#footnote-ref-12)
13.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7页。 [↑](#footnote-ref-13)
14. 解玺璋：《梁启超传》，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2012年，第46页。 [↑](#footnote-ref-14)
15. 经堂:《康有为与梁启超》,《古今月刊》，创刊号 , 1942年第1期，19页。 [↑](#footnote-ref-15)